

方言 1989 年第 2 期 104—105 页(198) 年 5 月 24 日出版于北京)

跟丁声树先生在昌黎调查方言

熊 正 辉

昌黎方言调查是丁声树先生领导的最后一次方言调查。《昌黎方言志》出版后，丁先生就调到词典室负责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修订工作，离开了他领导多年的方言组。我是一九五八年大学毕业后分到语言所方言组工作的。当时丁先生是方言组组长。我到方言组没多久，就跟丁先生和方言组其他同志去昌黎调查方言。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，跟丁先生在昌黎调查时的许多情景仍历历在目。

那是一九五八年的年底，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派人专程来北京，邀请语言所到昌黎调查当地方言，编写昌黎方言志。丁先生原来就有个调查河北省方言的计划，想以此作为试点，摸索大面积调查方言并绘制方言地图的经验，以便将来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。丁先生为此还主持编制了相当详备的方言词汇调查表。所以，当昌黎县来邀请时，很快就决定方言组全体同志都去。记得我们坐火车抵达昌黎的时候，昌黎县文教局长在站台上迎接。丁先生穿一身旧的棉制服，戴一顶旧的呢制服帽，跟大家一样提着随身用品走下火车。后来过了一段时间，文教局长跟我们都熟了，他说，刚见面时真看不出丁先生原来是一位有名的大专家。

昌黎县政府安排我们住在县立一中，吃饭在教师食堂。伙食当然比不上在北京的时候。特别是到了工作后期，粮食供应开始紧张，经常只有白薯等粗粮。丁先生那时身体就不太好，有高血压，很多东西不能吃。可是丁先生坚持跟大家一样，自己排队买饭，卖什么吃什么，不愿意人家对他特殊照顾。

每一个地方的方言总会有一些使外地人注目的特点。昌黎城关话也有。一个是阳平字如果处在轻声的前面时，读一种低降而拉得较长的调型。还有一个是应答词 [ɲ̩ nei]，相当于英语的“Yes”。刚到昌黎不久，有一次逛商店，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说的一句话正好包含这些特点。丁先生随即也模仿着说。那位姑娘脸登时红了，以为丁先生在取笑她。陪我们的当地同志赶紧解释，说我们是专门研究方言的，是来这里调查方言土语的，不是取笑她。这才避免了一场误会。

在开始调查前，我们先跟当地同志了解昌黎全县的方言差别。根据当地同志的语感，昌黎话内部大致可以分为五片。经过共同研究，确定每一片选一个点做重点调查。这五个点是昌黎城关、张家石门、曹东庄、陈官屯和朱建坨。后来的调查结果，证实当地同志的语感还是有根据的。昌黎话基本上分南北两大片。南边一片儿化韵音值跟北京一样是卷舌韵母，古平去两声的浊声母字有连读变调。北边一片儿化韵是一个 [w] 尾，不卷舌，没有南边那样的连读变调。昌黎城关和张家石门同属南边一片，而彼此略有小的差别。陈官屯和曹东庄同属北边一片，彼此也有小的差别。朱建坨在儿化韵的读法上跟南边一样，而在连读变调上又跟北边一样。

在分组去五个点调查之前，大约花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讨论词汇调查表，也就是丁先生主

持编的方言词汇调查表。丁先生一直主持这个讨论,几乎是逐条逐条地过了一遍。主要是让大家掌握每条词调查的要求,明确词义范围,注意调查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差错。这样的讨论对我来说真是获益不浅。汉语方言在词汇上南北的差别很大。我是南方人,在南方长大。虽然在北方生活了多年,北京话的字音掌握得还可以,北方方言的词汇却了解得不多。经过这次讨论和接着的重点调查,对北方方言的词汇就不那么完全陌生了。

对词汇表的讨论结束后,我们就分成五个组分头去调查。因为我刚工作,丁先生特意让我跟他一个组,负责调查朱建坨的方言。我们这个组还有高玉振同志、科学院河北省分院的李行健同志,还有县文教局专门抽调来协助我们调查的小学老师王振泰同志。朱建坨在县城的东边偏北一点。先坐十来分钟的火车到留守营,然后再步行几里路。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铺盖卷儿。下了火车,公社派了一位社员老大爷驾着小毛驴拉的一辆小车来帮我们拉行李。我们住在一户社员家里。一间大约十五平米的房间,干净明亮。一铺大炕占了大半个房间,再加上两个大板柜,就没有多少可以站人的地方了,所以进屋就得上炕。睡觉,工作,学习,聊天儿都是在炕上。记音时就盘着腿弯着腰趴在小炕桌上记。一开始是用《方言调查字表》记字音。丁先生一直指导着我们,告诉我们如何比字调和定字调,如何归纳声母和韵母,如何调查儿化韵,如何记字音。我记得在调查儿化韵的时候,我把“歌儿”跟“根儿”记成同一个韵,把“街儿”跟“今儿”记成同一个韵。丁先生发现了,告诉我记得不对。我还跟丁先生争,说没错。丁先生就请发音合作人一遍一遍地发音,让我仔细听。后来听出来是有点差别。这时候我才发现,原来是我自己学北京话的时候就没有学地道,自己嘴里就不会分,所以也就听不出来。

在朱建坨调查结束后,又回到县城。其他几组的同志也都陆续回到县城。根据五个点调查的材料,拟出了一个大约有一百来个问题的调查表,再分头做普遍的调查,调查的结果将用来绘制昌黎方言地图。这次我跟王振泰同志两个人一路,一人一辆自行车,车后带着行李,隔几个村选一点,每点调查半小时到一小时。到哪村天黑了就在哪村睡。整整三天时间,在昌黎县的西南部转了一大圈回来。这次普遍调查显示了绘制方言地图的一个困难问题。出发前,大家对这百来个问题的调查要求也明确。但是在实际调查时又碰到许多未曾预料到的新情况。几路调查的材料对到一起,有许多就对不上。所以《昌黎方言志》中的昌黎方言地图一共没有多少张。那个时候,我们年轻同志受到大跃进“左”的思潮的影响,总认为老专家保守,这也不能做,那也做不了。其实是我们自己幼稚,知道得太少。

在昌黎调查总共有半年多时间,天天跟丁先生在一起,学到的东西,对刚刚踏入研究工作之门的我来说是够多的了。可是我学到的部分跟丁先生的整个学问比起来,又是微乎其微。由于丁先生转到词典室工作,又由于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不断,再加上文化大革命,在昌黎调查之后就没有机会再向丁先生学习。等到粉碎了四人帮,有可能而且自己也认识到有必要再向丁先生学习的时候,丁先生病倒了。

丁先生患脑溢血,住院多年,终于不治,与世长辞了。丁先生一生不务虚名,不图私利,钻研学问孜孜不倦,调查研究不辞辛劳。丁先生的学识博大精深,学风严谨朴实。丁先生的逝世,是我国语言学界的巨大损失,更是我国方言学界的巨大损失。丁先生的学问已经不能直接传授给我们了。但是丁先生治学的精神,治学的品格,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